探索华夏 赓续晋脉

百年山西考古

山西是中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方法与理念革新的重要实践地，承载着考古学从文化寻根、古史重建到文明实证的完整发展轨迹。

1926年，李济、袁复礼实施了夏县西阴村的首次发掘，将三点记录和层叠理念运用于田野，并于1927年在清华举办了首次考古成果展，出版了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基石。

跟随西阴的实践，1927年以西阴发掘为参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的山西学人卫聚贤，在山西晋南、晋中、晋西等地开展调查，发现一批古文化遗址，并与山西公立图书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于1930年发掘万荣阎子疙瘩遗址，1931年发掘了万荣靳村遗址，发现一批后来被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遗存，1932年出版了《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之发掘即汾阴后土祠遗址》报告，开启了山西考古人溯源逐本的现代篇章。

1955年，夏鼐主持黄河水库考古调查，在黄河北岸的芮城发现东庄、金胜庄、坡头等一批重要史前遗址，新中国考古力量由此深入晋南大地，先后发掘了芮城东庄及西王村等重要遗址，搭建了山西仰韶文化的编年框架。

195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设立侯马工作站，承担晋国遗址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等工作，被誉为“新中国考古第一站”，成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的先行样板。

1960年，汇集全国大量骨干力量的侯马大会战拉开序幕，数百人参与其中，交流经验，成为全国首个田野考古技术集训地。以黄景略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总结了布方、清理、绘图、采集、记录、整理等板块基本范式，后经系统整理，并在其他大型考古发掘项目中不断实践丰富，成为1984年首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的雏形，为中国田野考古的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遗址相继启动大规模发掘——一个追寻夏文化的踪迹，一个叩问“唐尧虞舜”真相，为破解这些历史谜团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这些重要发现基础上，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会上道出指导中国考古学转型发展的重要诗篇《晋文化颂》，将考古探索从文化上升到文明高度，并勾勒了北方文明发展的一个轨迹，为山西考古指明了方向。

循着这一指引，一群群考古学子走进表里山河、寻根探源：从西侯度到丁村，从西阴到陶寺，从东下冯到西吴壁，从新田到古曲沃，从平城到晋阳，山西以其连续的发展序列和独特区位优势，正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长卷上，写就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执笔：范文谦 张光辉）

1963年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

20世纪70年代东下冯遗址发掘场景

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会上题诗

作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山西省目前已发现旧石器遗存700余处，早中晚期自成序列，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中占有突出位置。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遗址，证实了早在200多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繁衍生息，为探索东亚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遗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首次独立主持发掘研究的旧石器遗址，对于构建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起到了关键作用。遗址出土的三棱大尖状器、砍砸器等，与峙峪遗址等北方小石器遗存共同构成了华北地区“两大传统”。遗址开创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持久影响。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现代人交流演化、细石器技术起源与扩散等具有重要意义。峙峪遗址的勒瓦娄哇技术、装饰品等显示了其兼具中西特色的石器技术以及现代人行为，进一步支持了东亚存在现代人复杂交流演化的论断。下川遗址船形石核、楔形石核等丰富的细石器遗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研究。柿子滩遗址距今2万年至1万年，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原地埋藏遗址，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向新石器农耕文明的过渡，为研究华北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与扩散提供了重要资料。

整体来看，山西旧石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为探索东亚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扩散、石器技术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支撑。

（执笔：袁文明）

芮城西侯度石制品

襄汾丁村古人类化石

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落下了中国学者首次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铲，以此为发端，历经百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质的中国考古学派。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诞生之时，就以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为目标。以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为例，无论是以探寻早期夏文化为目的，抑或实证与尧都的联系，破解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始终是首要学术目标。考古实证与历史文献、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模式，在李济先生主持西阴遗址的发掘时，便多有体现，一百年来这一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

以晋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依托着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文化整合，推动了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彩陶席卷中原、北方、江汉及东方海岱地区，进而整合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文明演化进程。以枣园文化为代表的晋南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广泛分布于晋陕豫交界地区。近年来在运城盐湖南岸发现的早期盐业遗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以晋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古国时代晚期比比皆是的超大型聚落，印证了山西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重中之重。黄河东岸的碧村，桑干河上游的吉家庄，沁河中游的八里坪，汾河湾旁的陶寺，涑水河流域的周家庄，中条山南麓的坡头，这些面积动辄百万，甚至二三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自北向南、由西向东，遍布山西高原。仅从聚落规模，已然傲视周边地区。而结构复杂的防御设施、大型宫殿式建筑，规划有序的族群墓地和大型墓葬，以玉器、铜器等为代表的高等级遗物集中发现，反映了古国时代晚期山西地区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这些都凸显了山西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中之重。

（执笔：赵辉）

翼城枣园小口壶

夏县西阴彩陶钵

襄汾陶寺彩绘龙盘

兴县碧村东城门及城墙

表里山河的地理格局，成就了山西沟通中原与北方的通道属性，而夏商时期该区域考古资源丰富，是从考古学视角上探索夏商文明、了解夏商王朝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样板区域。

晋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百年前，李济先生在晋南开展调查和发掘的西阴遗址，便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推动学界首次系统认识到晋南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使东下冯“类型”或“文化”成为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对象。

本世纪以来，在闻喜千斤耙发现夏商时期采矿遗址，绛县西吴壁、夏县东下冯等遗址又发现大量冶铜遗存，实证晋南中条山一带是夏商王朝核心资源产区。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以及平陆前庄方鼎的发现正是早商王朝加强对晋南管理的考古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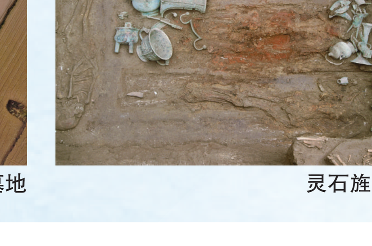
晋中、晋北地区的太谷白燕、忻州尹村等遗址，直观展现了山西夏商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格局。近年来，昔阳钟村墓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更新了我们对夏商时期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认识。

吕梁地区是晚商时期与殷墟并存的另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在南流黄河两岸发现大量精美的晚商青铜器以及灵石旌介、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等遗址，尤其是陕北清涧寨沟遗址的发现，均表明殷墟的西北方存在着与其制衡的另一个强大方国。

考古所见夏商时期的山西，多族群、多文化、多势力的交融与对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演绎。（执笔：崔俊俊）

昔阳钟村M10

闻喜酒务头墓地


灵石旌介M1

柳林高红26号夯土房址

近百年来，山西省晋文化考古依托关键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系统研究，厘清晋文化发展源流，补齐两周历史研究缺环，在中国周代考古体系构建中发挥了标志性作用。

晋侯墓地鸟尊

侯马晋国遗址是山西东周考古发轫之源，也是20世纪中国东周考古里程碑式遗存。历经“两次大会战”及数十年考古工作，实证其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区域内都邑城址、多等级墓葬群、盟誓祭祀遗址及侯马盟书、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重大发现，重塑了中国东周考古体系与先秦历史认知，以此建立的山西东周文化分期体系，引领黄河中游地区东周考古整体推进。同时，该遗址作为新中国早期抢救性、基建考古的典范，奠定了后世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工作范式。新田都邑外，数十年来逐渐形成覆盖山西全域的东周考古坐标网络。垣曲北白鹅墓地完整呈现平王东迁后周王室采邑分封、列国联姻、华夏与戎狄族群交融的多元图景；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为晋国古曲沃核心所在，再现晋国曲沃代翼的宗族权力更迭；太原晋国赵卿墓直观印证了春秋晚期异姓卿族崛起、旧有礼制瓦解的时代变局。这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推动东周晋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研究形成点面呼应的立体化研究体系。

曲村—天马遗址为山西西周考古集大成之作，亦是20世纪中国西周考古标杆遗存。考古工作不仅确认了晋国早期都邑地望，更建立了西周诸侯封国“文献考证+田野实证”的经典研究范例。其所揭示的西周晋文化整体面貌直观展现了西周“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的政治模式。遗址居址与墓地的年代分期研究，构建了山西西周晋文化完备的年代学框架，成为中原西周遗存断代的重要标尺，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时段的关键支撑。其系统化的发掘整理与科学严谨、及时全面的成果刊布，树立了中国考古工作的典范。同时作为北大考古专业长期实习基地，该遗址也为中国考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翼城大河口、绛县横水遗址开启山西西周封国考古的新篇章，是21世纪周代封国研究的关键遗存。两处墓地的完整揭露，颠覆了学界对晋南西周政治格局的传统认知，为社会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基础。结合洪洞杨国、浮山先国、黎城黎国等一系列封国遗存，为西周封建制度、宗法礼制与国家政体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苏秉琦、邹衡、李伯谦等学者围绕晋南各类遗存开展研究，以此为核心范本搭建起中国先秦考古核心理论与田野研究体系，筑牢学科发展根基。苏秉琦先生以晋文化研究为依托完善区系类型理论，确立晋文化全域研究方向；邹衡先生扎根曲村—天马田野一线，实证晋国早期都邑、建立西周晋文化年代标尺，夯实周代封国考古实证基础；李伯谦先生接续推进晋侯墓地发掘研究，系统凝练文化因素分析法，解析晋国族群交融与礼制变革。

依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三代学者接续深耕的理论研究，山西从纵向时序、横向空间、社会层级等多维度构建起体系完备的晋文化考古研究框架，成为国内外周代诸侯国考古研究最成熟的区域之一。

（执笔：段双龙 荆泽健）

绛县横水墓地

襄汾陶寺北M3011编钟

闻喜邱家庄M5001墓上建筑

山西汉唐金元考古持续深耕，依托平城、晋阳两大中古中心城市，以城址、墓葬、石窟、窑址手工业考古为抓手，百年以来构建起北方中古文明完整考古序列，为认识民族交融、丝路交流、市井文化、手工业发展贡献核心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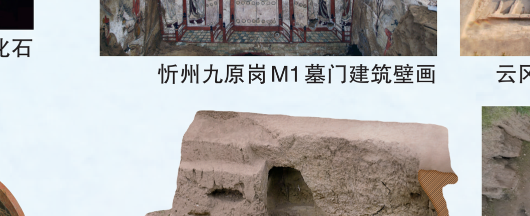
两汉考古以晋北、晋中、晋南汉墓群为基础，大量画像石、陶俑与建筑明器出土，逐渐厘清太行山两侧汉文化传播脉络、吕梁山脉汉匈互动关系，实证山西作为中原向北过渡地带的文化枢纽地位，完善北方汉代丧葬制度与社会经济研究框架。

北朝至隋唐是山西考古核心优势领域。大同平城遗址持续发掘，结合云冈石窟考古成果，还原北魏都城格局与佛教中国化历程；太原晋阳古城逐步揭露北朝至唐大型寺院、城市遗存，结合北朝晚期大量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实证“北都”历史地位。隋代虞弘墓惊世发现，以罕见祆教石刻，成为中古丝绸之路东西方人群交流标志性物证。蒲津渡遗址的发掘，填补唐代黄河交通、冶金考古空白。一系列成果推动北朝隋唐都城制度、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研究实现重大突破。

宋金元考古聚焦民间社会与手工业遗存，彰显近世社会转型图景。侯马、稷山、晋东南等地金代砖雕墓以仿木构砖雕、杂剧、孝子图像，还原北方民间生活、戏曲与丧葬民俗；霍州陈村窑考古厘清金元北方细白瓷窑业体系，填补金代民窑生产、商品化流通相关研究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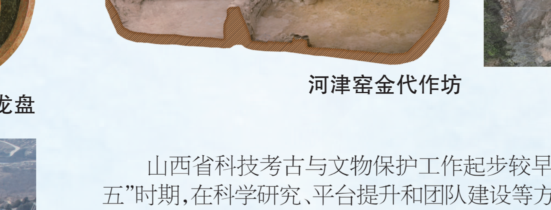
山西汉唐金元考古形成城址考古、墓葬美术、手工业遗存、石窟寺考古并重的学术体系，以实物印证多民族交融历史，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叙事，构建起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汉唐金元文明发展的年代标尺，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山西样本。

（执笔：白曙璋）


忻州九原岗M1墓门建筑壁画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太原虞弘墓石椁


河津窑金代作坊

霍州陈村瓷窑址

太原晋端王夫妇墓（M2）墓门

山西省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早，“十四五”时期，在科学研究、平台提升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成果丰硕。

在科学研究方面，主持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围绕“资源、技术、社会”开展中条山区域早期矿冶遗址调查和综合研究及环盐湖区域遥感考古调查；围绕“室外大型铁质文物保护”开展蒲津渡遗址铁质文物腐蚀特征和保护研究；围绕“生业、环境”开展晋西高原及晋南地区公元前3千纪至1千纪动植物资源利用及生业变迁等综合研究；围绕“精细化发掘”在垣曲北白鹅墓地建设地下考古方舱，推动田野考古技术创新与应用。

先后实施金属文物和墓葬壁画等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30余项，完成考古现场重要遗迹搬迁保护项目20余项，制订并发布《出土青铜器科技信息提取规范标本采集DB14T2364—2021FDIS》等地方标准3项。主持研发的智慧文博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系统（V5.0）荣获“第四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优秀奖”，承担的山西隰县瓦窑坡春秋墓地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在平台提升和团队建设方面，2024年8月，获批建设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重点聚焦冶金考古、遥感考古、实验室考古等研究方向，开展文物科技创新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多学科团队以中青年人才为主，覆盖11个研究方向，并与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协作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新的征程，我们将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以田野考古为生命线，围绕优势方向深耕细作，持续提升考古能力建设水平，推动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执笔：贾尧 陈海波）

实验室清理

垣曲北白鹅M1020地下方舱

回望百年，山西考古深耕三晋沃土，夯实了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立足百年新起点，我们将继续立足本土，面向国际，开放合作，构建新时代“大考古”发展格局，紧扣国家考古战略，扛起政治责任，深耕人类起源、文明探源、特色专题考古、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领域，补齐区域文明发展链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历史文明研究走向深入贡献山西力量。同时，以科技赋能考古研究和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考古成果活化利用，让三晋考古文脉代代传承，为阐释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建设文化强省注入持久动能。

（总策划：刘岩）

西阴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

西阴，因考古而盛名。西阴的考古学研究始于1926年，至今百年。

西阴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的“灰土岭”，地处涑水河支流青龙河中游，东依中条山，西望鸣条岗，南距运城盐湖直线距离约23公里，遗址面积约130万平方米，时代从仰韶到夏商。

西阴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分别发生在1926年、1994年、2025年至2026年，恰好对应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考古学科体系成熟、中华文明探源新阶段三个重要时期，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缩影。三次发掘在学术目标、田野方法、研究范式上的变迁，直观呈现了中国现代考古从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到建立本土考古学理论，再走向聚落考古、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完整历程。

第一次发掘区及其地貌环境

第一次发掘现场

第一次发掘，拉开中国人独立主持科学考古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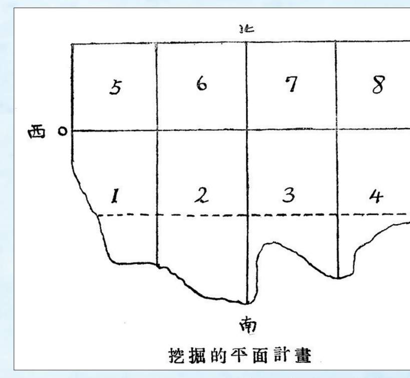
现代田野考古理念和技术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在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和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发现旧石器，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都是中国早期开展的考古工作，多由外国学者主导。这些发现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和探索，也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的关注。

1926年3月，带着探寻中华民族和文化来源的想法，李济和袁复礼开展了晋南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首次发现夏县西阴遗址。同年10月至12月，美国佛利尔艺术陈列馆主要出资，清华研究院组织考古团，李济主持、袁复礼主要参与，对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开展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被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

西阴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与研究，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很多第一次，被视为中国考古科学化的开始，也是中国学者建立本土考古话语权的开端。首创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田野发掘技术方面，西阴村的发掘采用2×2公尺布“方”发掘，交界处留有“土尖”（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关键柱）以作为研究土层变化的材料，披葱式（水平层）下挖，按照纵、横、深x-y-z“三点记载法”记录遗物位置，关注土质土色及其层位关系，这是中国考古界以地层学为基础的科学发掘的首次尝试，精细化的发掘与记录对后世田野考古发掘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二是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方面，1927年《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文版）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印行，主体内容为李济著，袁复礼撰写遗址地形地貌环境，报告附有发掘现场照、探方遗迹平剖图、出土器物线图、陶片统计表等，应为我国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其内容框架也成为之后国内考古报告撰写的基本模式。三是考古资料研究方面，1930年梁思永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英文版），整理研究了西阴遗址此次发掘标本，按照陶质陶色进行分类，并对陶器的口缘、器底、柄把等不同部分进行分型分式，这应是类型学在国内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上的最早应用。另外，据西北大学刘斌撰文介绍，收藏于佛利尔艺术陈列馆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英文版比中文版新增了陶片的成分分析报告、陶质显微镜照片、蚕茧的鉴定报告等，这也说明中国考古学多学科合作的优良传统应从西阴遗址的研究就开始了。四是考古制度的建立方面，为促成西阴遗址的发掘，规范多方合作，1926年7月李济与佛利尔艺术陈列馆拟定《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涉及合作方之间的权限、考古发掘和宣传的原则、发掘品的归属与保存、文物的复制与研究、文物展览等内容，应是我国首部考古发掘管理制度。围绕西阴遗址的这些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理念，为中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

第一次发掘出土彩陶片线图

当然，第一次的发掘也受到时代条件和学科发展的局限，发掘面积很小，对遗址范围、时代、功能布局、地层序列和遗迹单位等认识有限，研究重点多偏向于器物形态方面的讨论。但“西阴纹”“半枚蚕茧”及李济英文版报告中“His-yin culture”（西阴文化）的提出，让世界记住了西阴。



第一次发掘布方计划图

第一次发掘平面图

第二次发掘，构建区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如火如荼的考古工作，使得全国各地新发现层出不穷，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科体系的建立也促进了考古学人才队伍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界坚持强调田野考古工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加大综合研究力度，总结和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特点、理论方法、技术手段以及学科发展方向等问题。至20世纪80至90年代，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以求揭示中国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及其演变发展。在山西，太谷白燕、汾阳杏花及垣曲古城东关等遗址的发掘研究成为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早期实践地，并初步构建起这些区域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同时期，测年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的建立和研究的细化，再次掀起了学界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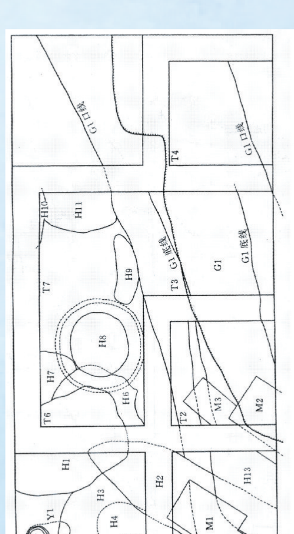
葫芦口双耳平底红陶瓶

1994年10月至11月，西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就是在这一考古学发展背景下展开的。此次考古发掘主要由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队伍完成，田野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与参与者，均是80年代在国内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系统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体系上经过了较为系统的考古专业训练，并积累多年田野一线考古经验，承担起了此项任务。他们接受了当时最新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并在此次发掘与研究过程中加以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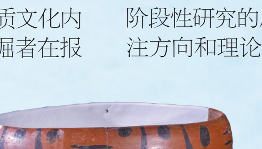
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面积为576平方米，发现房址、陶窑、灰坑、壕沟等遗迹，出土各类陶器、石器、骨器和少量炭化谷物等遗物，包含仰韶中期西阴文化、西王村类型、庙底沟二期、二里冈文化等遗存，其田野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于1996年发表在《三晋考古（第二辑）》中。这次发掘的意义有几点：一是完善了晋南地区运城盆地核心区的史前文化序列。发掘者通过规范的田野发掘，清晰揭露并厘清了各遗迹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结合典型陶器组合和类型学研究，确认了西阴遗址从仰韶中期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连续发展及其文化面貌，填补了1926年发掘材料的年代缺环。二是为进一步讨论“西阴文化”的命名与物质文化内涵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田野考古材料。发掘者在报告里提出“枣园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一本地史前文化演化框架，不再简单将晋南仰韶视作豫西庙底沟文化的地方亚型，再次证明了晋南运城盆地是西阴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区。三是促进了地方政府对西阴遗址的保护，发掘成果揭示了遗址价值，直接推动1996年西阴遗址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遗址划定保护范围、防止再度破坏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为构建中国史前文化时空框架和完善晋南文化谱系添砖加瓦，并引发学界对仰韶文化命名原则和区域类型划分标准的讨论，进而促进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再次思考和史前区域文化的精细化研究，可以说，完成了它阶段性研究的历史使命。今天来看，受当时学界关注方向和理论指导的局限，第二次发掘更多关注的是遗迹现象、遗址年代与器物文化序列的建立，而科技考古运用程度有限，缺少对聚落形态、古环境资源、生业模式及文化互动等方面的系统思考与深入研究，这也为之后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和学术命题。

第二次发掘出土器物线图


第二次发掘探方平面图

第二次发掘现场


彩陶钵

第三次发掘，谱写文明探源和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新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考古学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至今已开展五个阶段，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和成果。同时，国家文物局系统规划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也全面展开，其支撑开展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课题方向相继取得新认识，山西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关键区域参与到多个课题方向中。这一新阶段，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年代框架逐渐建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被重点纳入当今考古学研究和讨论的视野范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古地质环境学、分子生物学、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古DNA技术等，促进了考古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发展，也进而丰富了考古学界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颜料调色盘

当今，考古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变化，学界不再局限于分期和器物本身，而是更多地应用聚落考古的理念，从宏观到微观地去分析研究遗址的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社会组织及生业形态等，以及区域内各遗址之间的层级关系，并最大程度地保存和获取古代遗存信息。因此，2024年山西重新启动夏县西阴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并且在2025年至2026年开展第三次考古发掘，以期在这百年节点，开展新一轮综合研究，进一步探索晋南史前社会聚落形态与社会复杂化问题。

青龙河流域史前聚落群

第三次发掘期间做土壤微环境采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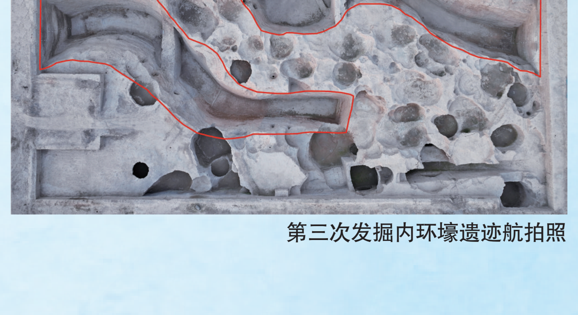
西阴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已持续两年，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山西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运城文保中心、夏县文保中心等单位进行，遗址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遗迹遗物以仰韶中期为主。在新理念、新技术、多学科团队的加持下，西阴遗址第三次发掘收获丰硕。一是进一步确认了西阴遗址是晋南运城盆地涑水河流域、盐湖附近的一处史前中心聚落，它与东阴遗址共同构建起近130万平方米的大遗址，时代从仰韶中期延续至夏商，不同时期中心有所迁移。该遗址在仰韶中期时最为繁盛，营建双重环壕，外环壕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内环壕入口处错位设置，应设有墩台等防御设施，为史前瓮城雏形，反映出西阴族群五千多年前较强的空间规划和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二是出土大量彩陶颜料加工遗存，侧面反映出西阴彩陶生产专业化程度。颜料盘、研磨石、磨盘、赤铁矿石原料集中出土，证明西阴遗址内部存在彩陶颜料加工的手工业场所，不再只把彩陶视为家庭简易制作，为探讨仰韶中期手工业分工、产品流通、彩陶文化符号传播交流提供重要线索。三是以实物印证西阴族群的跨区域文化互动。出土与大河村文化风格相近的高圈足彩陶盆，证明晋南运城盆地与豫中地区存在直接交流，深化了对西阴文化向外辐射网络的理解。同时出土石制蚕蛹类遗物，和1926年半枚蚕茧形成呼应，继续推进了对晋南仰韶时期养蚕缫丝起源问题的讨论。四是践行多学科联合考古、高校与地方考古机构协同的田野范例。本次田野发掘，多学科团队现场协同，同步开展地磁勘测、生业模式研究、微痕分析、岩相分析、环境考古等，是新时代多学科合作考古在山西史前遗址的又一次实践。

当然，西阴遗址当下的考古工作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新材料的发现推动学界对西阴遗址乃至西阴文化的认识又向前走了一点点，还有许多问题并未解决，比如聚落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是怎样的?是否存在大型高等级建筑?聚落的演进模式是什么?它与周边聚落群组之间的关系如何?盐湖的早期开发利用与它是否有关?西阴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第三次发掘出土彩陶

第三次考古发掘确认双重环壕分布位置图

第三次考古工作期间对地下遗迹开展磁测法探索


第三次发掘内环壕遗迹航拍照

结语

西阴遗址的三次发掘，不是孤立的三次考古工作，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史，是一代代考古人接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生动实践，折射出中国考古事业的整体变迁与发展。从1926年中国人拿起手铲，争取考古自主；到1994年依靠本土理论搭建黄河中游史前文化框架；再到当下以多学科及聚落考古理念探索文明起源，西阴见证了中国考古从学习引进，走向自主创新、回答中华文明重大问题的全过程。同时，三次发掘留下的宝贵资料，将持续推动晋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核心区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更可喜的是，西阴考古博物馆已落地夏县，它也将成为考古学界向世人展示中国百年考古历史、陈列西阴重要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舞台。

（执笔：郑媛）

版式设计：奚威威